

夏承焘先生早年学术道路试探

论夏承焘的词学渊源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扬弃

夏承焘诗史研究初探

2007—2011年陆游研究指数述略

关于陆游的夜雨诗

——以“夜里听雨”的主题为中心

《切韵》三等韵ABC

——三等韵分类及其声、介、韵分布和区别特征拟测

多音字“重”及其声调三分问题

会话书“《骑着一匹》系列”研究

《世说新语》中的“有”字句

——以“空间/时间存在句”为中心

中国现代性文学史观念的奠基意义与先天不足

——以胡适“文学史观”为中心的考察

视阈拓展与实践局限

——论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影响

“后现代”视野中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思绪之狐》：休斯的一个诗学起点

青春的诗学

——评莫洛的“叶丽雅”系列散文诗

中文学术前沿

第五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术前沿

第五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 第5辑/《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308-10681-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2274 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五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372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681-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 录

夏承焘研究

- 夏承焘先生早年学术道路试探…………… 钱志熙(1)
- 论夏承焘的词学渊源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扬弃…………… 朱惠国(13)
- 夏承焘诗史研究初探…………… 刘青海(24)
- 论 20 世纪 50 年代夏承焘先生时事诗词中的心路历程…………… 陶 然(36)
- 近三十年夏承焘研究述论…………… 胡可先(43)

诗赋研究

- 2007—2011 年陆游研究指数述略…………… 郑永晓(59)
- 关于陆游的夜雨诗
- 以“夜里听雨”的主题为中心…………… [日本]三野丰浩(66)
- 韩国“酒赋”与中国有关赋作之比较…………… 詹杭伦(74)

汉语史研究

- 《切韵》三等韵 ABC
- 三等韵分类及其声、介、韵分布和区别特征拟测…………… 黄笑山(83)
- 多音字“重”及其声调三分问题…………… [日本]水谷诚(93)
- 会话书“《骑着一匹》系列”研究…………… 汪维辉 [韩国]朴在渊 姚伟嘉(101)
- 《世说新语》中的“有”字句
- 以“空间/时间存在句”为中心…………… [日本]松江崇(119)

文学史论

- 中国现代性文学史观念的奠基意义与先天不足
- 以胡适“文学史观”为中心的考察…………… 南志刚(130)
- 视阈拓展与实践局限
- 论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影响…………… 刘 杨(139)
- 论文学史的人学本体…………… 朱首献(146)

域外视野

- “后现代”视野中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许志强(154)
 《思绪之狐》：休斯的一个诗学起点…………… 凌 喆(159)
 青年时代的鲁迅(1902—1909)…………… [斯洛伐克] 马利安·高利克(167)

求是创作论坛

青春的诗学

- 评莫洛的“叶丽雅”系列散文诗…………… 吴红涛(182)
 一个“闯入者”的大爱情怀
 ——莫洛和他的诗文…………… 孙良好(189)
 诗国的流浪汉
 ——简论莫洛的诗歌、散文诗创作…………… 马大康(193)
 附：莫洛年表…………… 孙良好 吴红涛整理(197)

夏承焘先生早年学术道路试探

钱志熙

内容提要：夏承焘先生早年接受新式师范教育，同时又在世纪初旧学环境中接受传统学术的全面训练。他早年治学是从规仿清人经史子集研究的格局开始，在小学与史学、子学方面有尝试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传统方面，是同时接受乾嘉学派与浙东史学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同时也预流现代的学术。其在现代学者中，基本上是属于国故整理一派，与以南高、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群体有一定的联系。严州教学时期，选择词学为专攻，并确立通盘研究的计划，逐项推进；但其早年的经世致用、博涉多通的学术兴趣仍未改变，其个人心态上，词学研究常与宋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发生矛盾。由于实际上偏重乾嘉治学方法，使夏氏没有充分发挥他在辞章、义理及史学方面的特长，完成词学全盘计划中的词史、词学史著述。研究夏氏的早年的学术发展道路，对我们今天的学人在选择专攻方向，较好处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夏承焘；词学；乾嘉学派；浙东学派；博与专

夏承焘先生以其在词学研究及词体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被推为一代词宗。但夏氏的学术研究不仅局限于词学，他早年在经史诸子等多个领域尝试研究，并形成以宋史与学术史为重点的研究计划。将近而立之年，选择词学为专攻，但并未完全放弃早年的研究计划，并受 20 世纪上半期活跃兴盛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术风气的鼓荡，对词学之外的其他文史学领域也充满了研究的兴趣。但他最后在学术史的确立的位置，还是一个以词学为专精、同时在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领域都取得丰富的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夏氏所走的这条学术道路，是时代与个人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以高度的辞章之艺为基础，文史方面的深厚积淀和多方面的学术经验为前提，对词学进行专精深入的研究，有为并世学人所不及之处。但是，从个人的学术发展道路来看，夏氏所走的学术道路，是比较曲折的，甚至是充满着个人选择上的矛盾。在博涉的兴趣与专攻的治学原则之间不断调停斟酌的作法，几乎可以说成了夏氏学术的一个特点。他所确立的几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如宋史、学术史研究与词学研究之间，既有相成之用，但也不无相克之处。诚然，对这个复杂问题，浅陋如笔者，是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的。但从夏承焘研究本身，以及对今天的学人的启发来看，研究夏氏的学术发展道路是有必要的。这其中，博与专，丰厚的人文学养的积淀及广泛的学术兴趣与学术专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笔者所感兴趣的。

—

要比较深入地探讨夏承焘的学术道路，不能不从他早年求学的经历入手。夏先生“自十余岁辄学为日记”，但其已经公开发表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是从 1928 年 7 月 20 日开始的，此前日记尚未发表，早年文稿也多未整理问世，这为我们研究其早年的治学道路增加了很多困难。吴无闻先生在

夏先生去世后所著《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以下行文中简称《年表》)^①,以及吴蓓先生近年发表的《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②(以下行文中简称《日记述略》)一文,提供日记中的部分资料,可谓弥足珍贵。

夏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是在上世纪初新旧学交汇的求学环境中走上自己的学术道路的。他六岁从顾惺石发蒙,后就读林家私塾、养正小学、永嘉第一高小等学校,与郑振铎同学,至十四岁考入省立温州师范,十九岁毕业^③。从入读高小与师范的学历来看,他可以说是传统的文史学者中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人。晚清经学大师、教育家孙诒让创立的温州师范,禀承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呼应时代风气^④,在课程设置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如教育学、心理学、西洋史、英文、化学等课程,都是属于西学、或者说新学的范畴的。这从其培养的人才后来分布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也可看出。^⑤夏承焘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不守旧、及时接受新学,并且对外国文学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在文化观念上也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兴趣广泛,与他早年所受的这种新式的师范教育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夏先生在求学道路的起点上,就与纯粹接受旧学教育的前一辈学者有所不同,已经具有比较典型的新学背景。夏氏具有博涉特点的治学风格,与其早年在师范院校接受多学科教育、并曾经以中、小学教育为终生职志的经历也不无关系。师范教育与一般的大学专业教育有所不同,它的专业性并不很强,但对知识面的要求比较广。所以师范教育与一般的专业教育,自有博涉与专精之不同。另一点,即是对于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特殊重视。他在1917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三十年修教育学,以十年图阅历天下各国,采其教育方法及风俗民情,然后毕生躬行教育事业”,并说:“处事以百折不回之坚忍心,务达我教育事业之目的。”^⑥对于教学的一贯重视,可以说是夏氏重要特点。夏先生门下名家、大家之多,分布领域之广,是我们已经熟知的事实,这与夏先生的教育精神与方法是分不开的。他之所以被称为教育家,并非虚泛之誉。这一点恐怕是得益于早期师范教育的积极影响,也是我们今天高校专业教育所缺乏的。

世纪初中师教育的新学体制经过夏氏自觉的消化,并且通过后来对西学、新学的不断汲取,使其学术无论从精神与方法来看,都足以预流20世纪中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主流学术。他虽然不治西学与新学,但对社会科学、文艺学的新成果、新方法是尽量积极汲取的。这方面的证据,《天风阁学词日记》中随处可见,如“阅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不忍释手”(1928年8月17日),“阅《现代名人传》,屡有感动,我即不能为爱迪生、爱因斯坦、麦苏士,独不能为泰戈尔、甘地耶?”(1928年11月1日)“见胡适译拜伦《哀希腊诗》一首,甚爱之”(1928年11月1日),“灯下阅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论歌德篇”(1928年12月14日),“阅日本内崎作三郎《近代文艺的背影》,王璧如译”(1928年12月11日),“阅伍光建译法国大仲马《侠隐记》四五回,持较《水浒传》,究相差甚远”(1928年12月19日)。这是他1928年8月到12月阅读外国典籍的情况,还不包括同时阅读的多种时人词学之外的学术著作,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胡适之《白话文学史》,还有许多与词学无关的文史论文。这种情况,并非某一时间的独特表现,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夏先生对新

① 吴无闻:《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载《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1页。

②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周笃文等主编:《全国第二十四届中华诗词暨夏承焘吴鹭山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7-254页。

③ 吴无闻:《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上书第211页。

④ 永嘉学派在温州地域沿承的学术传统在近、现代温州学人的新旧学交替中起到积极作用,尤其是经世思想与近现代温州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⑤ 据有关文献调查,地质学家南延宗、昆虫学家任明道、文史学家陈经(竺同)、苏渊雷、胡颂平等都是十师的毕业生。

⑥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上书第239页。

学、西学及西方文学及文艺理论作品之博览，是今天一般的古代文学学者所远远不能及的，在他同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具体的证据《天风阁学词日记》中随处可见。可以说，他是在一种渊博、开放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追求中，完成其专精的词学事业的。他是如何在旧词学中融会新知，是值得研究的。

二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代词学研究的奠基者夏承焘，又可以说是从世纪初、典型的旧文学环境中成长的，他早期的基本角色可以说是博涉经史的诗人与词家。这在夏先生这一辈学者，并不能说是罕见的，但借助地域内浓厚的创作风气，以及其业师张震轩、林鹗翔及慎社、鸥社的诗友，加上个人的努力与天才，其早年在诗词艺术方面的成就之卓越，在同代学人中可谓凤毛麟角。其词艺得到朱彊村的点拨，又被叶恭绰选入《广篋中词》，古近体则被陈衍《石遗室诗话》摘录，并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为他后来的词学研究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他在古典文学的各个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之所以进出自如、游刃有余，与其辞章功夫之深是分不开。年辈稍后于夏氏的饶宗颐先生也是以高度的辞章之艺为其领域广阔的文史研究的基础。传统的辞章之艺对古代文学甚至一般文史研究之重要性，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夏承焘先生早年就读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进入温师之后，因个人爱好兼有张震轩等精通旧学的师长的引导，在课业之外，比较系统地习读儒家经典，温习《四书》、《五经》，自述十三经除《尔雅》外，皆曾熟读成诵。张震轩即张桐，入邑庠为学使潘衍桐、徐致祥所赏，刊其文入《浙江试读》，“并诏七属诸生以桐读书为法”。后被孙诒让延请为孙氏诒善祠塾讲课。^①《张桐日记》1915年5月1日条记载为洋楼书塾诸生订《自强斋》学约，单日习四书、《左传》、《毛诗》、《周礼》、《史记》、《通鉴》、《国策》，双日课古文（《古文辞》、《经史百家钞》）、辞章诸艺，并坚持记日记、短札，临帖。^②夏先生的早年的课业，受张桐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他曾为文怀张震轩先生，称“予学字学词，皆张师启之”。^③作于1916、1917年的日记，频繁记载温读经书的程课，如“读罢四书全本”（1916年4月8日）、“《周易》已重温三次，虽皆曾经背诵，然除《系辞传》及《说卦》、《杂卦》诸篇外，实皆未尽顺口也。”（1917年8月17日）、“温《左传》数卷，每篇虽皆背读十余次，犹另星散落，欲求十分顺熟，殊堪难也”（1917年8月13日）。日记中还说到读经计划，“予意拟读完三十经，以为读书根本”（1917年9月15日）^④。自宋儒以来，以经学为读书、治学、制行之根本，即所谓“六经根柢”，夏先生正是按照这种观念来读经的。除了经之外，夏先生在史与子方面，也有过比较系统的学习，并且重视小学，熟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清人《说文》学著作。其在小学方面的功底，实属深厚。对此吴蓓有这样的论述：“虽然经、史、子、集都在夏承焘的博览范围之内，但青年时代的夏承焘，还是沿承了清儒的理念，将治经、治史放在‘正途’的位置。而小学做为研经的基础，遂格外得到夏承焘的重视，其中尤以对《说文解字》的研读最具代表性。”^⑤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夏先生早年读书、治学的基本方向的。从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来看，夏先生早年曾经从事过小学方面的研究，其于1929年致邵潭秋的信中说：“秦中数载，治小学及宋儒思想，皆无一成”，^⑥又《年表》载1927年7月，作《说文通论》、

① 俞雄选编：《张桐日记·前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张桐日记》，第192页。

③ 《夏承焘集》第六册，第449页。

④ 转引自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28页。

⑤ 《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31页。

⑥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114页。

《说文广例》。^①又《天风阁学词日记》1929年2月7日条记载:“与杲明繙《说文》,欲依双声或叠韵求字义,东冬韵皆有大、多、高义,支韵皆有小、碎、直、尖等义,元韵有远义,诸如此类,分部移录,亦可成一书。嘱杲明着手为之。”李杲明浙江瑞安人,是夏氏早年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三十早夭,有甲骨文研究的著作,为夏先生所保存。^②又《学词日记》1935年10月24日条:“阅报,黄季刚卒,有义贯一书未成,谓审音可知义,如洪、夏、恢皆训大,江淮河汉海及华恒衡霍皆有大义。予曩尝思拆开《经籍纂诂》依字义另成一书,亦此意。徐益修先生释小、释曲诸篇可取法。”^③日记中像这样属于语言学的内容还有很多。可见夏氏的学问出于清人经学,其在传统的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功夫,在他后来的词学研究中是起到作用的。他的《“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四声绎说》等论文,都是得益于深厚的音韵学功底。其对姜白石旁谱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其在文学与语言学方面的扎实功夫之上的,王延龄先生认为白石旁谱破译工作包含着“文学与语言的理论与技术”^④。可见显示深厚的小学功夫、运用传统语言学的方法与技术,是夏氏词学的一个特点。老一辈学者语言、文学不分家的治学特点,在夏先生的身上体现得很突出。夏先生的嫡传弟子任铭善、蒋礼鸿两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平生读书、治学与夏先生关系紧密,他们也是走夏先生那样的经史子集博涉的道路,最后选择以语言学为专精,这与夏先生的影响不无关系。夏先生重视小学,对他们应该是有影响的,夏氏还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两位学者在语言学方面的成果。如《四声绎说》一文在论述四声与五音的关系时,就引用“予友任铭善”之说。^⑤我们可以说,夏先生的治学,是从规仿清人经学、小学开始的。晚清时期的温州地区,乾嘉经学仍然十分流行,地方上经师很多,孙诒让更是一代大师,张震轩则亲受孙氏之学。夏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学术道路的。

三

夏先生开始尝试学术研究,应该是在他二十岁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的。传统学术研究,亦即著述之业。夏先生对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解,也是将其作为一种著述的事业来看,著书是夏氏一生最大的兴趣。这种表现其实是比较传统的,与现代学术将研究的根本性质定位于一种问题的解决有所不同。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他在任桥小学任教时,有《学诗偶谈》、《学愚斋笔记》之著,虽然我们现在还无从见其内容,但可以说这类早期的作品,实为其有意著述之始。这时期对夏氏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有积极影响的一件事情是1920年暑假的南京暑期学校学习。吴无闻先生的《年表》对此有记载:“五月……乘海轮离温经上海至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学习,教师有胡适、梅光迪等……七月,作《墨子哲学长处和短处》语体文……八月,自南京经宁波、上海返抵温州。”^⑥胡适、梅光迪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但又是主张兼融新旧的,用新方法、新思维研究传统的文化。梅氏还是《学衡》派的主将,夏氏的学术倾向与《学衡》派最接近,是属于整理国故一派的。他的同乡前辈学者林公铎也是属于《学衡》派的,夏氏与他有过接触。^⑦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胡适、梅光迪大概是夏氏最早接触的新派学者。《张桐日记》1920年11月21日条记:“夏生承焘来谈南京、苏州事”,

① 《夏承焘教授纪念集》,第222页。

② 《张桐日记》记载1934年6月4日在夏承焘先生之江大学寓见李杲明夫妇像、杲明篆书条幅,并容庚作序的龟甲文手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③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403页。

④ 《夏承焘教授纪念集》第59页。

⑤ 《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第二册,第423页。

⑥ 《夏承焘教授纪念集》,第215页。

⑦ 《天风阁日记》1934年11月26日条记载“记大石桥十号访林公铎,尚记昔年海晏同舟事。”《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38页。

其中记载了夏先生对此行的看法：“又言胡适之在南京演说，语尚中肯，谓人必须先蓄根柢乃可言新文化，而西国罗素先生新来中华演说，其主张则劝中国宜以保粹为主义，新文化潮流总觉太急躁也。”^①在后来的词学研究中，夏先生对胡适之的词学、俗文学研究都有比较多关注，在有关词的源流方面，胡适及受胡适影响郑振铎的词起源说，对夏氏有所影响，但夏氏又以专门词学家的学识对胡氏的词学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②另外一点，这次听课也是夏氏与南高、东南大学的学者建立关系之始。南京高等师范(1912—1920)是东南师范教育的重镇，师资雄厚，并且兼融中西，其中王伯沆、柳诒徵、陈中凡等旧学精深而又有新学气象与格局的宗师，其对东南学术的影响极为深远。后来与夏先生同事的王驾吾、胡士莹都是南高的学生。南高后改东南大学，夏先生的好友，一生在治学上与其桴鼓相应的曲学家王季思，就在1925年就读东南大学中文系，并从吴梅先生治学。夏氏从吴梅问学，也始于此期。又《学词日记》1928年9月22日记载：“借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六册，东南大学讲义。”次日日记又载：“阅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可为予《中国学术大事表》参考。”东南大学教授吴梅更是东南词曲之学的现代奠基者，夏氏在进入词学专攻之后，在词乐研究方面一直向吴梅问学。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夏先生与南高、东南大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934年11、12月份，夏氏侍父游览南京，遍访唐圭璋、陈匪石、汪辟疆、林损诸人，并在曹纘衡席上见柳诒徵。或许可以这样说，对于主要是从温州地方的旧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夏承焘先生来说，南高、东南大学的学者群是他较早接触的大学文史学者群体。

无论是夏承焘的诗词创作，还是其学术研究，西安五年都是很重要的时期。从创作上讲，这时期是其独具个性的创作风格开始形成的时期。尽管他自己说“秦中数载，治小学及宋儒思想，皆无一成”^③，但从学术道路来讲，此期是其学术意识自觉、学术理想确立的重要阶段，也是其开始在现代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时期。^④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夏先生的身份，已经由一个单纯的文人墨客转变成为职业性的学者，并且开始从规仿清人学术到预流当代的治学风气。关于夏先生西安五年中在经、史、诸子及性理之学方面的治学情况，吴蓓的《日记述略》根据其早年日记及相关论著遗稿，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于我们了解夏先生早期学术研究活动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夏氏早期的学术活动有几个特点，从学术思想来讲，学以致用特点明显。这个致用，从内在来讲，究明修身养性、敦品励行之学；从外在来讲，究明经世致用之学。从学术的格局来讲一是领域广；二是计划宏大。下面我们尝试从这几个方面来概括夏先生的早期学术活动：

从发展逻辑与实际的经历来看，我们发现，最早也是比较长久地吸引夏氏学术兴趣的是宋明理学，亦即性理与义理之学。夏氏原为辞章之士，由辞章而转性理，在文人中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有学者论此云：“大抵才华之士，早岁则喜吟诗，暮年则喜谈道，所谓少年词章，晚来理路。”^⑤晚清以来文人治性理之学的，更不在少数。但夏先生的由辞章之士专注于性理之学，从思想发展的逻辑来讲，是由其青年时期修身养性的内在需要发展出来的。夏承焘就读的温州师范学校，课程中有修身一门，校长姜伯韩极重此门课程。^⑥姜伯韩治教育学，著有《欧洲教育史大纲》^⑦。他同时崇尚儒教，

① 《张桐日记》第283页。

② 《天风阁学词日记》1928年8月份记载阅读胡氏《词选》、《白话文学史》，8月4日有作胡适一信。1929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阅读《小说月报》所载郑振铎《词的起源》一文，对其“胡夷里巷之曲，乃词之二大来源”的看法表示赞同。这也是夏氏后来经常阐述的词源之说。

③ 《夏承焘集》第五册《天风阁学词日记》第144页《致邵潭秋》。

④ 《年表》载1924年6月，《民铎杂志》五卷四期发表《五代史记解题》一文。《学词日记》1928年8月30日记为《民铎杂志》九卷四号，并说年是周予同代投的，夏先生本人对此文的发表并不满意。

⑤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天真阁集五十四卷、外集六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4页。

⑥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36页。

⑦ 《张桐日记》第297页1921年10月19日条记载：“伯韩乃示予所撰《欧洲教育史大纲》二册，系商务印书代印。”

民国六年曾欲上书教育部变更祭孔典礼,国文教师张桐为其翻阅《策学备纂·礼制门》中的一切祀孔典礼。^①姜氏以出身寒微而重治行、得时誉,著有《道德概论》一书,为十师师生所推崇,后为暨南大学校长。^②夏承焘的恩师张桐,更是传统儒者,尊孔重礼教,思想趋于守旧,但对新知识并不排斥。这些因素再加上早年习读儒经,可知夏氏早年是服膺儒术的,以儒者持身的。其由习经而重制行,由重制行而欲治宋明理学,可谓顺理成章。据吴蓓的翻阅,“在西安的数年日记中,有关修身的日记占有较大的比例”,曾著《省身格》检查平日的行为,自省近于苛刻。其1923年2月9日的日记记载:“(近来)多读性理书,欲以躬行心得为诸生倡。每日课其为日记,订功过格,颇有兴起者。”“区区之志,惟求寡过于身,为一谨飭之士。在一校则化一校,一乡则化一乡,一家则化一家。希不虚此生于人世。”^③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中走向宋明理学,对二程、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著作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用传统理学家方法治学。在诸家中他对于阳明心学尤多心得,常视为体悟心性之归宿。这时期,他甚至懊悔从前溺于词章,虚费岁月。1922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拥被观阳明年谱,有会心处辄欲起舞。读书学圣人真人间第一等学问,从前沉溺词章,可怜可惜。”^④阳明早年也是辞章之士,夏氏对此犹感亲切。他在早年也曾对西方哲学有过阅读,曾以自己的体会比较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与阳明知行之说,得出两家似同而实异的结论:

苏氏知行合一说:人欲实行道德者,在知道德于人之为善;其不知为善者,以不知善之为善。彼知而行犯之者,未可谓真知;知己之得而求其利,我未见其人也。与阳明说似同实异。(1921年12月19日日记)^⑤

阳明的“良知”是心性本体之知,虚灵圆觉,应物而自生,超越于世俗功利之上。苏氏之知善而能行,是一种利害之观,必以认识到善即利而始能行之。虽然其以善为利与世俗的自私自利不能等同来看,也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的,但毕竟是一种功利之说。夏氏由此发现苏格拉底知行之说与阳明知行之似同而实异,可证其对于性理之学的体悟已经达得很深的境地。不仅看到苏氏哲学与阳明心学之不同,其实也已经看到西方哲学在道德论上与儒家思想在根本上的差异。可见后来新儒家一派常说的中西哲学会通,夏先生早年也已有所实行。除了宋明理学外,他似也曾较多地涉猎内典。夏先生号瞿禅,在之江大学时,学生曾向他请教此号的含义,他说自己因长得清瘦,双目瞿。并说:“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也在圣贤书中、诗词文章中,更在日常生活中。”^⑥这番话虽似平淡,却有很深的儒佛会通的功夫在里面。夏先生学习佛禅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大清楚,但对一个对宋明理学具有浓厚兴趣、对人生真谛充满探索愿望的青年学人来说,涉览佛经禅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自号瞿禅是在什么时候?笔者尚未能遍检夏氏文集求之。但据《张桐日记》1926年4月29日,有“偕夏瞿禅赴府庙街某宅访符笑拈大令”一条,其时夏先生27岁,已从西安游归,在瓯海公学、十中任教。^⑦可见夏先生自号瞿禅,是在27岁以前。这时可能是他由治阳明心学并进而研究禅学的时期。《年表》并载1925年9月,足成旧作《洒周自金陵书来劝究内典作此答之》一诗。洒周即陈竺同,永嘉人,夏氏在十师的高班同学,曾在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学习。^⑧《天风阁学词日记》

① 《张桐日记》,第225页。

② 《张桐日记》1917年5月1日条记载黄群、刘饶宽来师校演讲有关道德人格的主题,并称姜校长《道德概论》大有益于师校教育,望此书速刊行以为诸生矜式。见本书第230页。

③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40页。

④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42页。

⑤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35页。

⑥ 琦君:《春风化雨——怀念恩师夏承焘先生》,载《夏承焘教授纪念集》,第155页。

⑦ 吴无闻:《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同前书第220页。

⑧ 周梦江:《怀念陈竺同老师》,《温州读书报》2009年1月13日。

1930年11月6日条，“接适君复，知陈竺同洒周在复旦讲南北曲及佛教文学。”^①陈竺同劝其究内典，可见其平素在佛学方面下过功夫。夏氏在宋明理学及佛学方面虽未见专门论著，但从《学词日记》中看，他对宋明理学与佛学的兴趣持续终身，中年时期，曾研读《阅藏知经》、《大乘起信论》等多种佛典。我们研究夏氏学术，对其在性理与义理方面的深厚修养应该特别重视。

夏氏早年的著述，贯穿子、史、集三部，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1920年21岁时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受胡适等人启发，用语体文作《墨子哲学长处和短处》，是其尝试子书研究之始。其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写成这样的论文，大概还是因为早就已经阅读《墨经》。其师张桐曾向孙诒让问学，夏承焘阅览《墨子间诂》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西安时期，夏氏对子书作过比较系统的阅读。据吴蓓介绍，其所藏遗稿中有《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割记》、《扬子法言》割记、《读荀子界说》等。尤其是《读荀子界说》，夏先生自称是“予之著作破题儿”，其界说荀、孟性说之异同，兼用新学的一些概念，在方法上受到梁启超《读孟子界说》的影响。由于深厚的旧学功底，精通典籍，夏先生对胡适等人“好为系断加以粗忽，遂至厚诬古人”有所批评，其《荀子界说》也是针对胡适的一些观点而发的。^②

在史学方面，夏承焘的经世特点更加明显。他认为：“我国古学之须研究者，一为通史，一为性理。史可识治乱大体，性理乃立品之本。”^③此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夏氏最早的学术实践，为何选择理学与史学为两大重点，并且终身未曾真正放弃。自南宋以来，史学即是浙学的重心，并且据章学诚之言，浙东史学渊源于服膺象山心学的甬上诸子，后来精通章学的张尔田氏与夏氏的通信中，也指出这一点。^④夏氏理学、心学与史学兼治，与浙东学术的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从史学思想与方法上看，夏氏受章学诚的影响相当深，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讨论。夏氏新婚之夜携《文史通义》入房避客。^⑤1925年西安任教时期，曾著《章实斋学案》。^⑥1940年曾开《文史通义》课。^⑦他自称：“治学则最早得力于汉学师承记、文史通义二书。”^⑧其所作《中国学术年表》、《中国学术地表》以及学派专史《关学师承表》等，是深受章氏重视表、谱的史学思想的影响。1934年12月19日的日记，受章实斋强调“人表”的重要性，认为表非比类征实之学的思想启发，对宋史研究计划作了一番调整：“予思治宋史，先从表着手。成宋史表一书，先从文学、理学着手。文学先从词人着手，作词人系年表。理学先从永嘉着手，作永嘉学系年考，则年来辛勤搜集之词人遗事，不致废弃。又实斋所谓史学别录，予亦久有此意。”^⑨又受章实斋《史学别录例议》启发，欲用其法治宋史，札宋史及宋人文集笔记为一书，曰《宋史别录》，并考证其异同，另为一编《宋史考异》，罗致其关系风俗制度者，别为一编，曰《宋史别志》。^⑩从传统的影响来看，夏承焘先生是深受浙东学派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浙东学术的直接的继承者。其治学之奥秘正是引浙东史学入词学，入文学史学。

夏先生早年的经史诸子研究，在格局上还具有领域广，计划宏大的特点。从涉及面来看，经史子集，四部殆遍。夏氏是从旧学营垒中走过来的，中国传统的治学，向来不划定区域，兼综群学。与夏先生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有这个特点，最典型的如蜀中学者刘咸忻，也是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其

①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165页。

②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48-249页。

③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引1923年4月16日记，同前书第249页。

④ 《夏承焘集》第五卷，第334页。

⑤ 《夏承焘集》第五卷，第172页，《学词日记》1930年11月24日条。

⑥ 《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同前书第219页。

⑦ 《夏承焘集》第六卷，第178页，《学词日记》1940年2月19日条。

⑧ 《夏承焘集》第六卷，第241页，《学词日记》1940年10月22日条。

⑨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50页。

⑩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64页。

著述的特点也是兼综群学,著书二百三十五种,意欲弥纶整个中国古代学术。稍早于夏先生的章太炎、梁启超甚至胡适等人,也都是兼通群学的。梁氏、胡氏尤其重视用比较新的考证和史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史与思想史,他们的治学方法对夏先生都是有影响的。夏先生一方面继承传统的经史子集不分的清儒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受这些现代学者的影响,加之自幼勤读四部,积累丰富,其开始走上治学道路的时候,也是以博涉群学为特点。其由辞章之士而走上经史诸子研究的道路,其学术背景与渊源,是多层次的。中国古代的诗人、词家,都是同时精通经史诸子之学。宋、明以来理学盛行,许多诗文之士,也兼涉义理、性理、心性等学。晚清以来的风气,诗人、词家更是多兼通经史之学,如沈曾植、陈衍、张尔田等人,各有专精。在夏氏的学术道路上,这些人应该都是对他发生过影响的。

夏氏早年的经史诸子之学的治学实践,是其后来词学研究的基础。程千帆先生对夏先生词学与清儒之学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

窃谓此老之于词学有不可及者三:用力专且久,自少至老,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旁搜博考,悉资以治词,比之陈兰甫之偶考声律,王观堂之少作词话而毕生精力初不在此者大相径庭,一也。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采用,以视半塘、大鹤、彊村所为,远为精确。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二也。精于词学者,或不工于作词;工于词者又往往不以词学之研究为意,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能兼之,三也。^①

现在通过对夏氏早年学术的探讨,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即是用他自己早年的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

四

夏承焘先生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在近而立之年,开始选择词学为其研究的重点。夏氏开始专攻词学,是从1927年9月赴任严州中学开始的。《天风阁词·前言》中夏氏对自己的词学研究道路有一个简单的交代,称早年学词得常州派书,略知词之源流正变,然中间舍去为他学。“其后客授严州,乃重理词学。并时学人,方重乾嘉考据之学。予稍涉群书,遂亦稍稍摭拾词家掌故。三十左右,居杭州之江十年。讲诵之暇,成词人年谱数种。”^②关于夏氏严州开始治词的具体情况,吴蓓《日记述略》所引1927年10月4日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

拟以四五年功夫,专精词学,尽集古今各家词评,汇为一编,再尽阅古今名家词集,进退引申之。自惟事功非所望,他种学问亦无能为役。惟小学及词,稍可自勉。明正当着手为之。

又据吴蓓介绍,其于十月间搜集词话竟,并确定长期的词学研究计划。夏氏自认其专攻词学始于严州,《天风阁学词日记》从1928年7月20日开始的,就是一个标志。所谓学词日记,实为“词学日记”之谦称。7月20日这一条中说:“再繙宋史一过,查词人传作词林年谱。日来颇复厌此,以属稿将半,勉强成之。”据《日记述略》,《两宋词林年表》的撰写始于1928年3月,至此已阅四余月,而属稿将半,可见用力之勤奋。夏氏之专精词学,一时殆未旁骛,对于长期博涉经史子集,著述没有比较明确的计划、阵地屡移的他来说,这真是与从前不同的学术工作状态。态度与方法决定了工作性质,也决定了工作的成果。从这一点我也可以说,夏氏真正的学者生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上面所引1927年10月4日日记,或者也可以称为夏氏学术发展史上的“严州之悟”,其对于现代词

^① 《词学》第六辑,程千帆:《论髯翁词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夏承焘集》第四册,第113页。

学的意义,或许也可比拟阳明的龙场之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在一个学者的学术发展史上,根据主客观条件,确立、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夏氏早年崇尚的内治心性、外致世用、领域广阔、规模宏大的学术思想及初步的实践来看,词学实在只是极小的一隅。他之所以没有更早地选择词学,正是受这种传统的看法影响。经过前期的学术探索,夏氏已经熟悉古今的学术思想,对学术的认识趋于清晰。但从西安回来之后,辗转温州等地,缺少安定的治学环境,而在故乡的几年,仍是过一种旧文人的唱酬吟咏生活。夏氏自小即立道德文章的大志,而此时近而立之年,终于在长期的探索后做出这种选择。这是服从了学术研究专门化的要求,是必须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标志着夏氏学术思想的成熟。思想与修养,需要广泛的学习与社会实践,文学家的成长,也较多地依靠博览旁通的学习方法,但是学术研究要想取得尖端的、高质量的成果,必须走专精之道。夏氏在其早期治学过程中,斟酌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处理专与博的关系:

念治学不可旁鹜,年来为词人年谱,姜白石词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精者大者,为安心立命处。日来读声韵书,又见猎心喜。第恐方面太多,不能专一耳。(1934年9月30日)^①

月来早晚枕上,殚心述作,头绪千万,欲为《南宋史表》,为《述林清话》,为《宋理学年表》,又欲专心治词不旁鹜,苦无人为予决之。(1935年2月8日)^②

灯下思量作宋学系年要略。不专主理学,以年表体裁掇揽一代学术风会,并加论断。天五好宋学,他日归雁山时,可以为连业功课也。又拟扩大词史范围为词学六书:一词史,二词史表,三词人行实及年谱,四词例,五词籍考,六词乐考。草稿初具,不知何时写成。造端甚宏,甚恐精力不济。安得三数学生共成之。(1939年12月22日)^③

使予一生专治词学,不患无成。而近颇思鹜博,欲治宋史,又欲为著述义例之书,此皆大车冥尘,非二十年不能卒业者。正恐头白可期,汗青无日。灯下阅实斋博约篇,不禁感慨!(1940年2月19日)^④

枕上思能成《词学志》数十卷,亦足不朽,不必鹜高远治宋史。(1935年3月14日)^⑤

在他治词的前期(30、40年代),并没有放弃早年的一些学术计划,并且不断有词学之外他认为更为“远者大者”的学术计划产生。但由于他一开始确立了词学方面的宏大计划,而在工作方法上,早期的词人年谱、白石词旁谱考证,又采用乾嘉朴学与现代实证研究的方法,所以客观上不可能再大幅度地游移在数个学术领域了。

同时,在事功与学术,甚至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夏氏这个时期的思想,也逐渐明确,以学术为主要的工作。1929年9月18日记记载:“夜作子野词考证。年来读书,时有不入时之想,细思真人生,在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何必婢阿附俗,强所不能。我国文学待垦植掘发之地尚多,止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任公、静安皆独有千古。”^⑥这是他基本上放弃以事功入世的一个标志。又1929年6月7日日记载:“自恨既往之身世,不活跃,不宜于文学。若长此以往,只得自勉为学者,将无分于作家。”^⑦从这些情况,我们看到,虽然夏氏早年以辞章之艺起家,但是真正选择

①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23页。

②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61页。

③ 《夏承焘集》第六册,第159页。

④ 《夏承焘集》第六册,第179页。

⑤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69页。

⑥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119页。

⑦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99页。

词学与古典文学为其终身职业,却是在近而立之年做出的决定,这里面是有过犹豫与矛盾的。他晚年有这样的自述:“我自师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①我们说,这个十年的探索时间,可以概括夏氏学术道路这样一个历程,即从博涉、规仿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到向以古典文学为专业、并以词学为专精的发展道路。

但是,作为传统的学者,夏承焘先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是根深柢固的,在强调夏氏近而立之年选择词学为专精的明智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的词学本身在循序渐进,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在细密地推进。但专精词学本身与他的学术理想、尤其是内求性理之明,外求经世之用的学术观念之间的矛盾,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使他常给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带来矛盾的心态。尤其是当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别的学术计划产生矛盾时,常使他处于焦虑的情绪中。这也是我们研究夏氏的学者心态所应特别注意的。

五

夏氏词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通盘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就是全面研究词体的发展历史,创立现代词学的学术体系。他所做的具体工作,也是在通盘计划下进行。1927年治词伊始,即拟撰述《中国词学史》(或《词学批评史》)、《历代名家词评》、《历代词话选》、《名家论词书札》四种书。稍后又有仿拟朱彝尊《经义考》作《词学考》、继张宗橐《词林纪事》作《词林续事》、《两宋名家词评传》、《两宋词林年表》等著作的构想。^②对于深受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及重视史学真义的著述思想影响的夏氏来说,以《词学史》为词学撰述之首,是很自然的。这也可以说是夏氏词学研究的最高理想。但是在承传浙东史学体大思精的史学传统的同时,夏氏又深受作为清学最高成就的乾嘉学术思想及方法、以及现代从西方传输进入的实证学术的影响。选择了从史料学、考证学入手来研究词学,其内在的逻辑是认为只有全盘地整理、研究词学文献,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词学史。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夏氏的方法并非多头同时推进,而是先进行专题研究。要全面研究词史与词学史,首先要对词人做出系列的个案研究。由于词被视为小道,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中,词人远不如诗人重要。从宋代以来,诗集的笺注整理、诗人年谱、传记的编撰,比比皆是,至有千家注杜之说。词集的笺注整理则远不及诗集,而词人生平的研究更是罕见。近代词学发达,但词人生平的研究仍付阙如,“夷考作家行实,以供学者知人论世之助者,自海宁王氏清真先生遗事外,亦不数觐。”^③所以,夏先生的工作就从词家别集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开始。这项词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可以说是终其一生。在最初十年间,着力于《唐宋词人年谱》的编撰,并整理姜夔的《白石词》。这是他一生词学研究中最重要两个成果。其中白石词旁谱的研究,则是由词籍研究而深入词乐研究的领域,为现代的词乐研究奠定了基础。上述两项研究都可以说是带有攻尖性质了,它奠定了夏氏在词学研究上的地位。尤其是在词乐研究方面,夏氏依靠早年经学的功底,继承勘别清人的燕乐与白石旁谱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同时积极学习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成果,通过问学、通信与当世的通人专家相互研核,终至达到词乐研究的高峰。但对于夏氏整体的词学研究计划来说,这只是两种局部的工作,他自己认为“究非第一等著作”。夏氏的白石旁谱与词乐的研究,堪称是学术研究的典范性工作,对我们如何从事专题研究有启示作用。在上述工作稍能就绪后,夏先生又将重心转到词体本身的研究,

① 转引自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53页。

② 吴蓓:《夏承焘早年日记述略》,同前书第252-253页。

③ 程千帆:《唐宋词人年谱序》,载《夏承焘集》第一册,第1页。

参照俞越《古书疑义举例》的体例，撰著《词例》一书。《天风阁学词日记》1932年1月2日中详尽地制定了词例的具体例目，共达58例之多。如果说《词人年谱》反映的是夏氏在史学与文献学上的深厚功底，那么《词例》例目的制定，则是夏氏词学上全面功力的反映，尤其是其在词体艺术方面长期的创作经验与对历代词集的丰富的研阅成果的反映。比之词人年谱，《词例》更是词学研究的当行本色之业。1933年《词学季刊》的《词坛消息》登载了《夏瞿禅草创词例》的消息，并介绍《词例》的体例，称其“分析之精密”，并将其与万载《词律》相比，认为“《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贯穿全宋元词为一系统。如此伟大著作，甚望其能早完成。近闻初稿已大致就绪云”。^①《词例》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从宋元各家词里札出材料，这是其后近二十年间夏先生在词学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词例》的最后写成时间待考，据现有资料，夏氏在1949年整理其旧稿十五种，其中词学十种，第二种即为词例，注谓“皆未写出，在各词集书眉者，亦未札入”。^②除了《词例》，夏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的词学撰著之关乎大体者，尚有《词林系年》、《南宋词事》、《四库全书词集提要校议》、《词迻》等书，以及《乐府补题校笺》、《词源笺证》等专题研究。^③《词源笺证》是沿白石旁谱研究而来的，是属词乐、词律的专门化学问。由这些情况可知，夏先生三四十年代的词学研究的基本进路，是由史学、文献学而进为词籍整理、校笺，进而为词乐之专深研究，进而为贯穿宋元词整体的《词例》、《词迻》的著撰。这些都是在其词学研究全盘计划下进行的。随着他的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地调整，其词学研究的全盘计划也在不断调整，越来越趋于严密化、体系化。至1935的12月19日的日记记载：“拟扩充词迻范围为词学典，四十以前拟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谱表四书。词学典用辞典体裁。”^④至1939年12月22日的日记，“又拟扩大词史范围为词学六书：一词史，二词史表，三词人行实及年谱，四词例，五词籍考，六词乐考。草稿初具，不知何时写成。”（见前文引）夏氏词学研究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同时，这个时期，夏氏古典文学的其他领域的研究，随着教学与阅读的深入，也在展开。并且多用其词学研究的方法辐射其他文学领域，如《日记》1932年7月2日“灯下读《离骚》，拟作《离骚》辞例”。^⑤1935年1月24日“下学期教《左传》，拟仿孙隘堪太史公书义法，作《左传辞例》一书”。^⑥应该说夏氏的词例研究的方法，并非仅仅局限于词学，它本来就来自于经学与小学，也可推广至其他体裁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讲，夏承焘的学术研究，准确来说，是以词学为核心的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尤其在与词学相邻的诗学领域的研究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⑦

上世纪30、40年代，可以说是夏承焘词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到了五六十年代，夏先生词学方面的各项专题研究也仍在继续进行，但是他在整个古典文学的教学方面投注了相当多的精力。这个时期夏氏词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尝试运用50年代流行的理论与批评模式，对词史、词家、词论进行论述。这在五六十年代，也可以说是一种预流的学术研究工作。这从夏氏词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说，是对早年全盘计划的落实。客观地说，夏氏虽然列了一个宏大的治词计划，并且以词学史、词史的撰述为其最终目标；但由于禀承乾嘉学派与现代实证学术的精神，其基本的工作性质是属于考证学，虽然其考证学是建立在其对词学的全面素养之上，其中包含着美学的内涵，但终究不是正面研究词史与词学史。所以他五六十年代尝试对词史、词家、词论做正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治学

① 《词学季刊》创刊号221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②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54页。

③ 同上。

④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416页。

⑤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00页。

⑥ 《夏承焘集》第五册，第358页。

⑦ 刘青海的2012年4月浙江乐清全国夏承焘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试论夏承焘的诗学思想和诗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会议论文集）。

方法的转型,但这些研究受当时流行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的框架约束是很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能说他这个时期的词学研究,还是他30、40年代词学史、词史研究的原有旨趣。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贬低自己前期偏向于考证的词学研究方法与成果。《月轮山词论集·前言》认为自己以前词学考证工作是因小失大。^①如果纯粹从夏氏自身的词学研究宏大的计划来讲,他的这种自我评价不能算过份。夏氏早年在经史诸子方面的研究,多属宏观探讨,思辨、义理的性质很明显,而其在词体艺术方面的知与能,又非他家所比,在这种很好的主观条件下,他主要选择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以治词,的确是有所偏差的。我们前面说过,夏氏同时接受乾嘉学派与浙东史学,但两者之间却是有矛盾的,夏氏的解决办法则是主要服从了乾嘉学派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而等到他尝试进行词史的理论及批评工作时,又面临了文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变。他自称“解放前后,才开始写评论文字”,“解放以后,由于朋友的鼓励与教学的需要,我开始试写几篇作家作品论。我的文艺理论知识很浅薄,所以这几篇词论大都只是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②可以说,以他本人对词学史及词学理论与批评的标准来衡量,他对自己的这类新工作不是很满意。应该说,比较完整地表现出夏氏的词史观及词学理论与批评的高度,还是《瞿髯论词绝句》及《唐宋词欣赏》两著。但是它们都不可能视作夏氏词史与词学史研究的真正理想的著述。他词学研究计划中词史与词学史的著述,始终没有完成。

本文只是就纯粹的学术研究形态来探索夏承焘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并且着重于论述其从早年的经史诸子之学向专精词学的发展情况。对于词学,本文也只取纯粹学术之一义,事实上,全面意义上的词学还包括词体创作在内。这样看来,夏氏治词是差不多贯穿他整个求学、治学生涯的。无论从广义的词学还是狭义的词学来说,夏氏的词学都是博大精深的。本文对夏先生词学研究的探讨,不但肤浅,而且漏略太多。对于夏氏词学历程的全面探讨,只能待之于来日。

2012年7月27日初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① 《夏承焘集》第2册,第239页。

^② 《夏承焘集》第2册,第240、241页。